

# 论赋的起源和赋文体的成立

□ 傅 刚

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

最早的赋是什么样的文体,是否即汉人概念中的赋,限于材料,难以详知。我们现在能够见到最早标明为赋的文体,是荀子的五赋。这五篇赋的特点是谐隐的形式,在今本《荀子》中排在第二十二,但据唐人杨倞说,刘向整理时排在第二十六篇。

秦人杂赋当与荀子的赋相类,荀子利用当时民间流传的俗体略为加工,锻炼成篇,题名曰赋。赋的命名,或当时在民间已经有这种称呼,荀子取赋之名,而又据自己所作文主题,分别加以礼、知、云、蚕、箴等题。当时在民间流传的赋,应该包含了多种形式的说唱文,如成相等都可称为赋。其通俗的形式,并不入文人之眼,但在民间流传却很广,为下层人所熟悉。所以秦人在统一天下之后,便广为利用这种形式宣传政府的政策,如睡虎地秦简之《为吏之道》等便是。秦人不重文学,但杂赋却盛极一时,这与秦地文明化不如东方六国、文风不盛有关。

这种被称为赋的文体,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,就是它的包容性,即它能够先将秦时期的诗、书等文献之外各种不同的押韵的俗文体都包括在内,因此它的实用性强,这在文体正处于发展时期的秦汉时,是一个很好的能被士庶接受的条件。汉之初,士人可能不会看重这种俗文体,但对汉代初年的士人来说,他们有政治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多种需要,官府规定的文体,如箴、奏、表、疏等,远远不能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,因此,这种能够包含多种形式的杂赋文体,应该能够提供他们在不同场合中使用。

在以下关于汉赋文体形成的讨论中,我主要想就三个问题展开:第一,《楚辞》是如何影响到汉赋的;第二,北方的杂赋是什么样的形态,在赋文体形成过程中占据怎样的地位,起到怎样的作用;第三,纵横家文与赋是什么样的关系,它是如何在赋体成立中发生作用的。

楚辞在汉时主要在南方流传,至少在汉文帝时,故楚地之人比较熟悉楚辞。景帝末吴地游士枚乘等去吴游梁,可为楚辞北传的文献记载。楚辞传至朝

廷,并令北方文士所知,当以刘安上武帝《离骚传》为有案可稽之文献。朱买臣当也是此时以名《楚辞》而入朝。至于杂赋,则主要流传在秦地,熟习者当是秦人。汉朝建立后,东方士人入长安,应该对此种文体有所熟悉。杂赋没有流传下来,当与荀卿五赋以及成相辞、谐恢隐语等相合,此种文体长于唱诵,但亦长于铺叙风物。荀卿五赋,虽有寓意,然形式为咏物,故铺写物状为此文体功能,它与楚辞之长于写情抒怀不同。故楚辞与杂赋结合,即汉大赋主要成分。

汉赋的正式成立,一般认为是以枚乘《七发》为代表。将《七发》视为赋,是今人的理解,事实上,直到南朝萧统编《文选》仍然单立一体,而没有放在赋体内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亦将七体类编在箴、铭、诫、赞之体后,皆与赋不相关。汉代班固《两都赋序》历数汉武帝、宣帝时作赋之人,不数枚乘,不过他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屈原赋类中,却又列入枚乘,这可能与前面所说的汉人关于赋的大观念所致。从文体辨析的角度看,自汉魏乃至元明,七体亦未纳入赋类。但至清代姚鼐编《古文辞类纂》,提出新的看法,辞赋类不仅收录了屈、宋楚辞,还收录如淳于髡的《讽齐威王》、庄辛的《说襄王》、东方朔的《答客难》、司马相如的《难蜀父老文》《封禅文》、扬雄的《解嘲》《解难》等,这个认识就本质上与我前文所说相合,即汉代士人除了熟悉的五经文献以及公府应用文体外,其因政治社会现实生活需要产生的文体要求,只能另外寻找合适的文体,而这些文体都带有铺叙和骋辞的特征。不过,姚鼐以为不必以韵否为限,但从赋在民间产生的情形看,战国末及秦,乃至汉初,还是以押韵合于说唱为主。姚鼐所认定的《答客难》一类,其实是汉代士人以战国纵横家文与赋结合而创建的一种新文体。这个文体从性质上看,与赋的铺陈扬厉相合,因此姚鼐将其视为赋,是有道理的。章太炎先生其实继承了姚鼐的说法,他是从骋词论纵横家文合于赋体的。姚、章之论,从本

质上说明了纵横家文与赋间的关系,不过,尽管赋体是《诗》不作之后出现的以铺张骋词为特点各体文的总称,但若区分文体,还是应将纵横家文的骋词和《楚辞》的骋词等区分讨论。毫无疑问,纵横家文是赋体发展的重要条件,而纵横家的活动,则是尤其值得关注和讨论的。

我的意见是,在赋的发展过程中,汉初的纵横家文人是关键。汉代初年士人所受最多影响的是战国纵横家文,这从贾山、贾谊、陆贾、晁错等人的文章,明显可见。纵横家文铺张排比,纵横捭阖,最称汉人之心。尤其汉初士人多怀梗概情怀,关注国是,所言多兴亡之事,故虽排比辞句,并不以博文繁饰为意,这与汉武帝时赋家不同。纵横家是战国时显著的士人阶层,他们以个人的才学,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,驰骋说辞,不日间便可位至卿相,绶青拖紫,因此纵横家在当时颇为读书人所羡慕。但随着秦皇统一天下,纵横家失去了用武的场所,势消焰息,但并没有完全灭迹。我们在秦汉的战争中,时常可以看到纵横家的身影。如酈食其、蒯通便是著名者。但随着汉定天下,这些纵横家彻底失去了场所,但我们在汉之诸王的身边,还是看到了具有纵横家性质的人群。如淮南王、吴王、梁王门下诸客,无疑有许多是学纵横之术的人。纵横家在汉代转变为辞赋之士,并以文辞为其游诸王的长技。因此,在汉赋的写作和文体的成立,主要是由汉代纵横家文人完成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我们看到,梁孝王时,当枚乘、邹阳、司马相如等人聚在一起时,“辞赋”一词便开始大量使用了。梁国是研究辞赋不可忽略的地方,贾谊是汉代朝廷文人中最早知道屈原的人,他从长沙到梁国,可能会把《楚辞》带过来。但当汉文帝时,这种作品在梁国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,所以没有见到相关的记载。其后枚乘诸人从吴国来,他们在吴时应该熟知《楚辞》了,当他们游梁后,自然会以楚辞作为写作的基础。但《楚辞》抒写个人情志较为合适,若托谕寄讽,或铺叙风物,可能不如杂赋,所以当梁孝王广建宫室馆阁平台,并要门客们歌咏时,他们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文体了。《西京杂记》所记枚乘诸人赋,就是这种背景下创作的新文体。

枚乘的《七发》写作于何时,学术界有争议,我的意见是,不排除写在梁孝王时,其在吴时确曾写过类似《七发》的作品,这就是北大所藏汉简《反淫》。又由于《反淫》罗列达九事之多,明显是七事还未固定前的蓝本。《反淫》未以数字标题,则见作者命题还是根据内容而定,至枚乘固定七事后,或枚乘定名为“七发”,或后人更定,已不能明了。《七发》以吴客说楚太子铺展全文,《反淫》则以魂魄对话构成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,如果枚乘《七发》写于吴王时,且谏吴王谋反事,内容敏感,应该不会直接以

楚太子和吴客生题,而像《反淫》中以魂魄对话,则没有这个担忧。以魂魄对话结构全文,既合《渔父》传统,亦与战国以来问答体有关,这也是汉人依据文与辞两种文体改造后所创的新体。

此外,无论《反淫》还是《七发》,所言诸事皆简明扼要,含讽谕之意,但像观涛一段,则与这个主题脱节,而纯粹是辞人骋辞夸物露才之作。因此,若说《七发》实际上是枚乘到梁国以后,与诸辞赋之士切磨研讨,对《反淫》重加编写的作品,也是可说得通的。枚乘此时与司马相如、邹阳诸人,结合楚辞、纵横家文,以及北方流传的可以唱诵的杂赋,遂创为一新文体,概名之曰赋。《七发》因是在《反淫》基础上改写,故不名为赋,但其改写可能在《苑园赋》之后。可作为参照的文献,是司马相如在孝王二十九年,即前149年游梁,居数月而作《子虚赋》,是见具有大赋规模的赋体,包括《七发》体的形成,应该是这个时期成立的。而据《西京杂记》所载,梁孝王诸客所写赋,多为咏物赋,这与枚乘的《七发》不同,也与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不同,应该与秦杂赋文体更相近。这说明成立于梁孝王时的赋,虽有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,也有诸客所作的咏物杂赋,其总名都是赋。由于司马相如的赋更具规模,影响更大,尤其是武帝的喜爱揄扬,遂使得这种赋广为人传,并成为汉赋的代表作,其余赋体则渐渐湮没不闻了。

从上讨论的结论是,汉赋文体的形成,由多重因素构成。就文体说,战国末以来流行于民间的说唱文体,总名为赋,至秦发展成为具有特征的秦杂赋。这种文体流行于以秦为中心的西北地区。汉代取得政权以后,东方士人入汉中,对这种文体有所熟悉,士庶中应该有所使用。与此同时,战国以来的纵横家并未消歇,在秦汉战争中,随处可见纵横家身影。他们惯于使用的纵横策文,在秦汉之争中一直在发挥作用,而当汉得天下,纵横家文仍然是当日士人擅长的文体,从陆贾、贾谊、晁错等人文可以见出。这种以骋辞为特征的文风,影响产生了多种文体,如问答体、辩难体,甚至书疏等。纵横家文在他们手里,又在汉代一统政权中得到了新的发展,他们以之论国是,辨存亡,排闼推闳,气势扬厉。这种文体写作主要表现在朝廷文人身上,至于游于诸王门下之士,则无如此宏达眼光和格局,往往以文辩为诸王所喜,故由游士变为辞赋之士,他们将流行于楚地的辞和汉初以来未衰歇的纵横家文,以及秦以来在北方流行的杂赋结合起来,遂创出赋体。其中由于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更符合汉人美学要求,遂成为汉赋的代表作,并被视作汉赋成立的标志,其实过程并不如此简单,而如上所言复杂得多。

■ 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

2018年第5期,约21000字